

# 读《唐诗百话》有感

高晶晶

家里侄子3岁,虽不认得几个字,但对大人教的诗却一字一字背得清楚。我对诗的兴趣也是从小开始,直到现在依然不减。每当看到别人写的诗,尽管对到底表达什么可能模糊不解,但还是满腹仰慕之情,感觉能写诗多有“文化味”。最近读了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对诗的爱又深入一层,对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了解也更多一些。

唐代是我国诗歌繁荣昌盛的年代。《唐诗百话》里将唐诗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诗,以讲诗人讲唐诗。唐诗还可分为绝句、律诗、游仙诗、杂体诗、咏史诗等不同类型。至于唐以前的古诗是什么样的,绝句和律诗有什么不同,不同年代的诗人有什么特点,他们的作品和经历之间有什么联系,施蛰存先生无不用浅显的语言娓娓道来。书中由于引用了其他研究者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见解,不免有文言文原文,而类似的观点也会让人难以区分。但是,作者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帮读者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就像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对于诗歌,不同境况不同经历的人读来也是完全不同的。作者在书中写道“诗无达诂,个人可以有各人的体会,但是,首先要掌握作者的创作动机”。对诗歌中“以意逆志”的现象,他并不过多地批判或附会。

王学文

“金银铜,明雨夏,三三见九,九九归一,天赐骏眉落武夷,茶神嗅品不离去。”《骏眉令》中如是说。

近年,想必在中国的喝茶者都听说过“金骏眉”之名。我们暂且先不论其选材上乘、制作考究等茶叶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单就这首懵懵懂懂的《骏眉令》,就足以领略附着在这小小茶叶上的几分魔力。《茶叶的流动:闽北山区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1644—1949)》一书则不仅让读者了解了采茶、制茶工艺,还勾勒出这一茶品的生命史。作者肖坤冰,作为一位人类学博士,其追求显然不是为喜茶好茶之人讲明白什么是“金骏眉”,而是要以“茶叶的流动”,勾勒出17世纪至20世纪初闽北山区向“现代中国”迈进的历史进程。

茶,在中国早已不是茶树上的那片嫩叶,那杯润津止渴的香茗,而是一种浸入到国人的身心体验和精神世界之中的物质,是人行草木间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茶,流动于雅俗之间,勾连着域内外,创造并生成着人与物、自然、精神、社会的关系和意义图式。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品的茶形、茶色、茶味,绝不是单纯的感官评判,而附着着太多的历史记忆、文化想象和生活感受。那么,这些意义是如何附着到这一物之上的呢?这一“有意义”的物又是如何影响地域社会的呢?肖坤冰通过在福建闽北山区、田野的实地调查,以“物的民族志”方式做出了回答,写就了武夷茶的社会文化传记。

在闽北山区,岩茶、红茶有着各自的地域空间。九曲溪下游为岩茶产区,九曲溪上游的桐木是红茶产区。无论是岩茶产区还是红茶产区,其产区中都有着空间等级的划分,即正岩、外岩,正山、外山,“正”代表着正宗、高品质、味道纯正、最高等级等一系列的价值判断。这种等级的形成虽然基于一定的自然生态,但肖坤冰通过文献的梳理和田野的访谈告诉我们,这种等级是在历代文人的“描摹”、域外经验的回归,以及种种乡野传说的塑造中形成并固化下来的,甚至还有美妙的历史“误会”。

“正山小种”是武夷红茶的代表。在当地的传说中,这是因为意外而做坏了的茶,但就是这样一个意外却收获了惊喜。在漂洋过海后,它成为“最好的中国红茶”。在经历原产地(福建武夷山桐木)、中间商(福建福州)和消费地(主要为英国)三种异质文化空间的流动后,它的名称和意义完成了从“乌茶——烟熏小种——Lapsang Souchong——正山小种”的生成过程。更为关键的是,从域外对于工艺和口味的强调,而演变为地域社会对于空间地位的强化。如果说“正山小种”的产生是无意为之的结果,那么红茶的新品种“金骏眉”则是一次有意为之的文化再生产。这是在严格的正山范围、海拔要求、采摘时间和制作工艺下,伴之以文化包装和阐释,共同创造出的高端红茶。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看到武夷茶成为链接底层与士绅阶层、农村与城镇、东方与西方的线索,不仅拨开迷雾,在历史脉络和文化生产中,为我们讲清楚了误读而生的“正山小种”和有意创造的“金骏眉”神话。而且在茶叶流动和生产的讨论中,为我们呈现出17世纪中期以来在武夷山这一特定时空坐标中家庭、地方社会、国家与更大空间范围(世界市场)的权力和文化的互动。

掩卷沉思,武夷茶的社会文化传记印证了“一茶一世界”的真谛,不仅有禅意,而且是现实。

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施先生说,《白氏长庆集》里题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宋人删去“送别”二字,明人又删去“赋得古原”。作者详细讲解了这首诗写作的背景和关于这首诗的故事,以及诗中公认的好句和不太合适的句法在哪里……不得不承认,从对一首诗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作者学识的渊博和做学问的认真,而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学到的又不仅仅是一首被他拿来或者列举出来的诗。

《唐诗百话》完成于1985年。第一话写于1978年1月4日,最后一话写于1985年6月10日,每一话的结尾都标有日期。看到那些连续的时间,我仿佛看到作者日复一日的伏案而作,或是查资料,或是停笔思索,刚读时作者讲了作诗要遵循的方法。由于理解不透彻,我真不想

继续看了。读诗是多么轻松惬意的事,怎么被这平平凡凡弄得糊涂起来。可看到每页后面的时间,我又忍不住继续往下看。哪怕有些不懂,还是努力跟着作者去思索、揣摩、猜测古人选一字一句的用意,对古人字字必究的精神感到不可思议,对用字的精炼表示赞叹。全书最后,作者细讲了一篇《秦妇吟》,这是一篇因种种原因,自宋朝开始已经失传了一千多年的诗歌。由于流传到西域,1900年在敦煌石室发现关于此诗的写本,被外国人伯希和整理后重新寄回中国。全诗重现了唐朝后期人民在战争中的悲惨生活,对当政者的描述也毫不留情,以“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而闻名。因战争而成诗,因战争而埋没,终于在和平年代被传播,一首诗的命运与国家的国运在无意中联系起来,由不得人不感叹。

《唐诗百话》完成于1985年。第一话写于1978年1月4日,最后一话写于1985年6月10日,每一话的结尾都标有日期。看到那些连续的时间,我仿佛看到作者日复一日的伏案而作,或是查资料,或是停笔思索,刚读时作者讲了作诗要遵循的方法。由于理解不透彻,我真不想



雪映鸡公山

郝光 摄

## 网络语的正与邪

高昌

前不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中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通知》,在业界引起很大反响,在公众层面也引起不少关于网络语的议论。

通知中要求各类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应严格按照规范写法 and 标准含义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字、词、短语、成语等,不得随意更换文字、变动结构或曲解内涵,不得在成语中随意插入网络语言或外国语言文字,不得使用或介绍根据网络语言、仿照成语形式生造的词语,如“十动然拒”“人眼不拆”等。这一通知的出发点是规范使用国家语言文字问题,并非专门针对网络语,但其中提到的网络语言问题,尤其受到了公众的关注。

网络语,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现的,更新快、数量多。很多网络语喜欢怪诞求奇,甚至打破正常语法规则,随意进行令人费解的组合变化。比如“十动然拒”是“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

TA”的省略形式,用来形容“屌丝”被所追求的“女神”或“男神”拒绝后的自嘲心情。而“人眼不拆”则是出自林宥嘉的一首歌曲,表示“人生已经如此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如果不了解这些生造词语的具体出处和原始语境,就很难理解其中的实际含义。这样的网络语如果频繁出现在广播电视和广告等公共传播领域,确实容易产生语言误导,尤其是容易影响青少年对母语的认知和理解。

一定意义上来说,广播电视和广告节目作为汉语言的一个公共窗口,在维护汉语言的纯洁、促进汉语言规范使用等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限制和拒绝某些生编硬造的“网络语”,是该受到公众支持的。而与此同时,由于网络语特有的某些幽默风趣和新鲜创意,我们也不能对其一概武断地加以否定和贬斥。记得几年前,网络语“给力”一词初次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并很快为公众所接受。而《人民日报》由此所体现的致力语言创新的态度,尤其受

到读者的肯定,网友甚至把这一事件看成为网络语“转正”和“上户口”的一个具体标志。

一些受到公众认可、并随着时间优胜劣汰生存下来的网络语,比如“给力”“拍砖”“伊妹儿”等词,鲜活生动幽默风趣,应该给其生存空间,直至收入辞典,融入当代汉语言的词汇宝库。对于一些生造硬造的“网络语”,比如上面提到的“十动然拒”“人眼不拆”之类,以及一些传递负能量的粗鄙低俗的网络语,则应逐渐矫正和淘汰,为公众营造一个纯净的语言空间。

网络语的出现和发展,是当代语言演变和进步的生动体现,应该允许它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演变空间。尽管表面上众声喧哗,而时间终究会大浪淘沙。在任何时代的语言发展都是一个活跃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止的一潭死水。耐心分析,网络语的确有正邪之分,而其中的激浊扬清、扶正祛邪之道,则值得深入探讨。归根结底,网络语并不是洪水猛兽。我个人认为,宜疏,不宜堵。

浪潮不会放过任何人,那么就只有以昂扬的姿态和积极的行动,去承担无可规避的命运。当然,将全球化当成宿命来承担,并不意味着就此而沉湎于宿命论。刘东进一步指出,正相反,只有在接收既定历史结构的同时,才能在对于历史的不断修正下,去减少、化解和驯服全球化所带来的“疏离和异在”,以避免最终成为这一过程中的输家。

围绕“中国特色”,刘东在《再造传统》里,还详细分析了申遗、语言、建筑、电影、中医、体育、通讯和家庭八个方面的传统,在遭到全球化冲击时,经历了怎样的侵蚀。譬如,在传统的中国式家庭中,我们既操演了最为严整的礼仪,又体验了最为丰富的人情,这样既能保障教育的完整性,也让前途得到把握。然而,在“易卜生主义”为代表的西方观念侵袭下,传统大家族中的负面效应却一味地扩大。这些传统本应在全球化时代提供有价值的观念,塑造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并缓和修正全球化的错误。

在刘东那里,全球化不再仅仅是一种宿命,也同样成为一种契机。它给予我们机会,去重新审视传统在现代背景下的价值。他表示,“全球化的离心力在于,它激发了地方独特意识的提高,实际上是地方特色的重构……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既大胆又谨慎的文化权衡!”这种文化权衡,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再造传统”。

## 《亲历抗战》

作者:光炜 周进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内容简介:

去年是全民抗战爆发77周年,今年将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殖民统治,带给北京的创伤刻骨铭心,在血与火洗礼中挺身而出的仁人志士永载史册。《亲历抗战》用20位抗日老兵口述的方式再现北京抗战史,真实、鲜活地记录那段悲壮却光荣的历程。



鲜活地记录那段悲壮却光荣的历程。

## 《移动时代生存》

作者:王建宙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移动时代,手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如果对欧美国家从电话到手提电话、寻呼机再到移动电话、智能手机的发展历程,人们不难发现,这一过程在我国大陆地区被大大压缩,迄今未满30年。本书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作者回应了针对中国通信服务行业的多项质疑,二是对通信服务与互联网融合的思考。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曾任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董事长的王建宙的叙述、阐释与思考,对于人们理解这30年中国经济尤其是通信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 《买书记历》

作者:陈晓维 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

内容简介:

39位爱书人围绕私人买书史这一主题,展开“各自表述”,他们既有闻名海内的藏书大家,也有深藏不露的民间高人,既有学者、编剧、媒体人,也有旧书店老板、公务员、自由职业者……涉及线装、新文学、签名本、近代诗词、非正式出版物等各项专藏,从琉璃厂、潘家园、上海文庙,到海外淘书、旧书网、拍卖场,既是相互独立的私人买书小史,又不经意间



相互呼应、穿插,构成1978年以降两代爱书人的“集体回忆”,全景展现30多年来国人买古旧书的面貌。

## 《天国之旅》

作者:裴士锋[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译者:黄中宪 谭伯牛(校)

内容简介:

作者裴士锋,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切入太平天国运动,特别着重英美各国在外交与军事上对太平天国战事的影响,将清军统帅曾国藩和太平军领袖洪仁玕作为讨论的核心人物。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评价:“精心琢磨的历史铺陈,是极出色的典范。从19世纪50年代初期至1864年的这场中国内战,可能是人类史上死伤最惨烈的内战;裴士锋以生动翔实的手法,呈现中国的统治者及其数千万子民的命运如何受到英国外交与商业利益的摆布,如何受到太平天国本身的非正统宗教和政治理念影响。一个悲惨且撼动人心的故事。”



内战;裴士锋以生动翔实的手法,呈现中国的统治者及其数千万子民的命运如何受到英国外交与商业利益的摆布,如何受到太平天国本身的非正统宗教和政治理念影响。一个悲惨且撼动人心的故事。”

## 《东西方艺术的交会》

作者:迈克尔·苏立文[英] 出版社: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赵潇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的是从16世纪到现代,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方艺术,与以西欧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艺术之间相互交流影响的历史。中国风为何会风靡18世纪的欧洲宫廷?中国与西方的接触虽然更早,为何受西方艺术影响却没有日本大……曾在剑桥大学等高校从事教学及研究的苏立文教授引导读者穿越



这风云变幻、瑰丽多姿的4个多世纪,清晰阐述出近代东西方艺术文化之间,彼此深深吸引而又对立排斥的过程,为我们厘清这段熟悉又陌生的纷繁际会。

# “全球化”:一种宿命,一个契机

——评刘东的《再造传统》

严杰夫

2007年年底始于西方的金融危机,将全球经济一起拖入泥潭。这样的情境,让原本就备受争议的全球化进程,再度成为众矢之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全球化的大败笔”的文章,指出欧美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因为深受“全球化的危害”;日本多摩大学教授中谷岩则批评全球化是一个“怪物”;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与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的谈话中则将此次危机看作是“美国东海岸精英的彻底失败”。

全球化危机的背后实际上是西方价值观的崩溃,在这里,反思全球化的思潮与反思西方价值观的思潮合流了。正如阿尔君·阿帕杜莱在《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中指出的那样,“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眼里,(美利坚)合众国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旧货甩卖场。它为日本人提供高尔夫假期和房

地产;为欧洲和印度提供商业管理的意识形态和技术;为巴西和中东提供肥皂剧灵感;为南斯拉夫提供首相;为波兰、俄国和任何敢试的国家提供供给学派经济学……”阿帕杜莱这种对全球化的尖刻讽刺,被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所注意。

作为过去30年中学界规模最大的两套译丛(海外中国学译丛、人文与社会译丛)的主持人,刘东显然并不是第一次注意到这种对全球化和西方价值观的攻击。在他长期进行的另外一项工作——国学研究映衬下,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全球化的失败,或许也意味着西方以外的价值体系的机会,其中就包括中国。

事实上,在上世纪末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显然是过去15年里,受到全球化影响最大的国家,这一进程再次将中国传统与西方“普世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推到了前台。于是,如何处理好传统与全球化这对矛盾——刘东在《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聚焦的问题,也就成为刘东和他的同侪们亟待

回应的题目。在《再造传统》里,刘东先对全球化的概念做了梳理。在这个过程中,刘东发现,“各国学者围绕着全球化的问题,几乎对每件事都没有共识”。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的那样,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则是悲惨的祸根。这样混乱的知识状态,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全球化尚在过程中。这意味着,一方面,全球化的过程给人类知识带来了冲击,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含义仍是“各种不同义项的叠加”。而与西方学者将“全球化”定义为西方化、国家化和世界化的同义词不同,刘东将全球化看作是普遍化和星

球化。他认为,唯有“星球化”这一义项,才强调了人类横跨星球的某种空前联系,并构成了某种新型的知识范式。也正是基于此,与其他批判全球化的学者不同,刘东将全球化看作是人类的一种“宿命”,正所谓“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推着走”。他表示,既然已经认识到全球化